

# “华南研究”对施坚雅区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杜树海 白爱萍

**【摘要】**施坚雅提出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国学者大量借鉴的理论范式。近四十年来,“华南研究”学者以及认同相关理念的学者基于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在继承施坚雅学术理路的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反思与推进。这些学者将文化活动置于区域体系构造中考察,关注“界邻”地区和跨区域的流动性,以及民间仪式联盟与跨区域联系,进行区域间的纵横比较与多重叠合区域关系的剖析等研究,提出了超越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

**【关键词】**施坚雅;区域研究;“华南研究”

**【作者简介】**杜树海,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白爱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

**【原文出处】**《人文杂志》(西安),2022.7.1~11

本文所谓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区域理论指的是其“市场体系理论”(特别是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如果说宏观区域理论是具体的区域划分,那么基层市场社区概念则已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这些理论曾对我国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末21世纪初广为学者所借鉴与引用。2004年《近代史研究》发表数篇重要论文,讨论前述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以及与中国历史事实的契合度。<sup>①</sup>可以说,如何在借鉴施坚雅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理论话语,一直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议题。“华南研究”结合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区域社会研究出发,在继承施坚雅学术理路的基础上,形成了超越施坚雅理论的区域研究学术经验。时至今日,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因此,突破国外的理论研究范式,构建体现深厚历史底蕴、多元社会文化的中国学术话语,成为时下国内学界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力图从施坚雅理论与“华南研究”出发,探讨“华南研究”如何实现对施坚雅理论的超越,进而构建了立足中国事实的区域研究学术话语。

## 一、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施坚雅在其《中国农村的

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国历史的结构》等论著中提出中国“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学术背景上看,施坚雅承袭了现代西方史学界多学科融合的学术风格,即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sup>②</sup>在学术思想上,施坚雅理论的立足点受到德国城市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影响。

### 1. 市场体系理论

20世纪60年代,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包含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三个层级的市场体系理论。施坚雅这一理论的贡献是率先倡导把市场共同体(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单位。市场共同体是在反思中国人类学长期把村落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时提出的,用他自己话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sup>③</sup>

基层市场是施坚雅设定的市场层级体系中最低

一级的市场区域,也是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内容,因此,笔者将对此重点介绍。为更好地论述市场结构作为社会体系的论点,施坚雅又把基层市场称为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以理性经济人的消费与交往行为作为立论的视角,根据抽象的数学模型推理,在分析中把讨论的背景假设在同一纬度的平原,且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是等距离的村庄。在这一理想状态下,基层市场区域是一个六边形,内部分散着等距离的村庄,集镇则位于中央,该六边形由内环的6个村庄和外环的12个村庄构成,并有6条小路将集镇和各村庄联系到一起。<sup>④</sup>它是能满足农民家庭所有正常贸易需求(包括出售自产物品和购买所需物品)的农村市场。它不仅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之所以命名为基层市场社区,关键是因为其中人群拥有交流、交往的枢纽。<sup>⑤</sup>因此,施坚雅赋予基层市场社区“共同体”的意义,基层市场社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

此外,基层市场不仅仅是作为物质交换的贸易区,还是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域。农民的各种关系网,如雇佣关系、婚姻关系以及大型宗族、秘密会社、寺庙、宗教等组织活动都依赖于基层市场建立。基层市场还与农民娱乐活动息息相关,这里是说书人、戏班子、卖唱人、卖膏药以及江湖术士的公共舞台,这些增强了其作为共同体的功能。<sup>⑥</sup>基层市场的阶层关系主要是农民、小商人和地方乡绅的关系,地方上层人物是农民与高一级官吏阶层之间的媒介。

相对于基层市场而言,处于上一级的中间市场介于中心市场和基层市场之间,在商品流通和劳务流动中处于中间地位,主要是集镇上的地方上层人士、商人来往活动的空间。而中心市场在流通网络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是重要的货物批发市场。一方面,它可以接受输入的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另一方面,它能收集地方的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sup>⑦</sup>

施坚雅认为,市场对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体系中,每个较低层次的体

系通常都面对着两个或三个体系,这与行政官僚体系截然不同。由此,基层市场可以参与到两个或三个中间市场的贸易关系中,中间市场亦同理。市场结构正是通过这样的连锁网络形式,使以各集镇为中心的小型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组成地区经济结构。<sup>⑧</sup>

## 2. 宏观区域理论

施坚雅将市场体系结构理论延伸发展为区域模型,在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阐述了另一重要理论——宏观区域理论。他按自然条件、经济数据与贸易网络等因素,把中国划分为西北、华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和东北等九大区域。之所以选择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研究,是因为经常打断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灾害与动乱,以及帝国朝廷一些关键性决定产生的影响几乎总是局限于一定的区域内。<sup>⑨</sup>因此,以细分区域为基础的研究会更贴近中国历史事实。

施坚雅提出了区域划分的四种方法:第一,可将一些高等级中心所能覆盖的最大范围经济腹地视为“区域”。把这一方法应用于19世纪的中国时,诸如西安、武汉、广州这类能够提供最高等次商品和服务的大城市的贸易区就可分类为第一等级区域。第二,以贸易网络来设定区域。施坚雅举例,可以用线条把一张地图上的所有中心点都连接起来,而线条的粗细与任何已知的两个地点之间的贸易量多寡成正比,那么经济区的核心部位看上去会密布连接较高等级城市群落的粗线。这个网络的线条越向四周外延则越细,处于区域周边的小集镇具体归之于哪一区域,要视其与哪一区域的贸易往来更密切而定。第三,依据一些经济数据来研究区域,这些数据诸如人口密度、人均收入、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值、耕地面积等等,其中又以人口密度为重。可将那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块作为各经济区的核心部分,经济区的边界可于两个核心区之间人口密度最低的边缘地带划分。第四,以自然地理特征作为划分区域的标志。施坚雅认为就农业社会的中国来说,以江河流域与山脉作为划分区域的要素是特别适宜的。在中国大多数自然地理区域中,促成地区功能一体化的运输网是以河道体系作为其主干线的,因此流域、平原可成为天然的区域,而山脉则构成不同区域的

分水岭。<sup>⑩</sup>

在划分区域的基础上,施坚雅借鉴欧洲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区域发展周期的理论,为横向的区域变量增添了纵向的时间变量。他认为“(中国)经济大周期是大区经济的系统性特征,而不是各省、也不是帝国本身的特征,因此,只有把区域经济作为分析的单位,才能清楚反映这一周期的时限。”<sup>⑪</sup>经济的发展与衰落、人口的增长与下降是周期的典型特征。施坚雅认为,帝国的发展衰落循环周期可称朝代周期,但并非就是不同区域的周期。不仅如此,各个区域的发展周期之间显然也不可能完全同步。

为证实区域发展周期的不同步性,施坚雅选取东南沿海区域发展周期与华北区域周期进行比较阐释。东南沿海地区第一个周期是北宋时期,此时东南沿海经济已经高度商业化。受明朝的海禁政策影响,该地区在1300年前后走向衰退。第二个周期时间较短,出现在16世纪,由于朝廷海上贸易政策的放松,东南沿海区域一度复兴,但明末海禁政策的实施和明朝抗清斗争又使该地区再度遭受冲击,出现衰退迹象。直到19世纪40年代福州和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后,该地区才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周期。<sup>⑫</sup>

总之,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是以近代经济学为背景的,无论是数据统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是“中心地”“六边形模型”“经济周期”等概念的引入,都体现了这一点。这种理论关注底层人群的需求与活动(尽管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并将之作为划定区域的重要依据,这就为传统上单纯以行政区划作为分区单位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当然,因受学术背景的限制,施坚雅还存在诸多的视角“盲区”,这也成为后人继续推进研究的重要方向。

## 二、区域与区域之外:“华南研究”学者的区域社会历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试图走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与市场共同体理论,以新的单位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杜赞奇在修正施坚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堪称重要一例。“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诸如宗族、市场

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sup>⑬</sup>杜赞奇认为,文化网络是由各种集团和组织交织在一起,其中的各种规范不能用市场体系或其他体系来概括。在研究特定区域之时,与其将目光仅仅局限在市场体系上,不如弄清各种组织形式的综合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市场体系理论中的某些成分,但也对施坚雅理论形成冲击。

直接对施坚雅理论进行反思和对话的是一批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研究起步的华南学者。由于这些学者学术主张的早期试验场是“华南”,力求从区域出发去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研究及其学术主张又被称为“华南研究”或“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些学者又被学术界称为“华南学派”。<sup>⑭</sup>近四十年来,“华南研究”学者一方面以施坚雅宏观区域与市场体系为研究起点,吸收施坚雅理论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反思施坚雅理论的局限性,致力于超越施坚雅理论。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文化活动:区域研究的新视角

“华南研究”学者中较早对施坚雅理论提出批评的是耶鲁大学的萧凤霞教授。作为施坚雅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萧凤霞并没有完全赞同施坚雅的理论。萧凤霞认为,“我们不能用‘立足于市场体系的经济理性’,作为考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格局的出发点。”<sup>⑮</sup>萧凤霞认为,施坚雅区域分析模式,具有功能主义色彩,缺乏具体的历史过程,忽视了人们的主观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所能发挥的作用。基于此,萧凤霞将“人”的因素纳入区域研究中,提出“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structure),而是‘结构过程’(structuring)。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sup>⑯</sup>这一研究视角指出,在思考区域研究时,要了解区域中的个人或群体是如何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人的能动性),编织意义之网的。

萧凤霞早期对广东中山小榄菊花会的历史变迁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体系的建构过程的研究,即

是关注个人能动性行为对区域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探讨。小榄作为香山县(今中山县)边缘地区的村落,由明代开始,经过几个世纪大规模的开发,发展成了一个集中大量财富和文化的市镇中心。由此,形成了小榄与周围乡村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区域分层体系。这一区域体系的发展形成不可避免地引起地方大族与乡村佃户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宗族的分化和整合。最初作为地方文人怡情养性的赛菊活动——菊花会则在此过程中成为地方人群争夺、掌控社会各种资源,在该地区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重要文化活动。地方精英一方面通过在宗祠举办花展,以维持本族内部的凝聚力和默认本族内各宗支的分化;另一方面通过出资捐助演戏和举办街坊花展,强化镇内以宗族成员为基础的居民与乡村佃户之间的主佃关系,进而向周围的竞争者们显示自己在镇上的权势。<sup>①</sup>

施坚雅把市场网络结构、交换关系作为区域体系形成的主导因素,萧凤霞虽受到施坚雅区域体系分层概念的影响,但她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边缘村落演变为财富和文化的“超级中心”(supercenters)是同宗族的剧烈分化和重组相联系的。萧凤霞对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是以人的因素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在其看来“这种人既是经济人又是政治人和文化人。区域体系的发展包含了这种人的因素积极地创造传统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个性和历史意识一再地起着重要的作用。”<sup>②</sup>由此,萧凤霞提出不应忽视文化形式(宗族、喜庆仪式等等)与文化个体在区域体系发展中的作用。从此研究出发,萧凤霞、刘志伟研究了华南沙田地区的族群问题。他们关注当地人群如何运用文化策略改变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进而呈现地方人群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能动性。<sup>③</sup>

萧凤霞对区域体系的构造进行反思,提出与施坚雅视市场交换关系为区域体系形成重要因素的不同观点,即个体的文化活动是区域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萧凤霞的研究把文化形式及文化个体引入施坚雅区域体系构造的研究中,并提出应把文化形式作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实现了研究视角从经济到文化的转换和拓宽。

## 2.“界邻”地区:区域研究的新取向

受到萧凤霞、科大卫反思施坚雅理论的启发,黄

国信在陈春声、刘志伟的指导之下,将“与施坚雅区域理论对话”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清代湘粤赣交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的目标。

黄国信通过考察清代湘粤赣食盐贸易过程,发现湘粤赣交界邻地区的市场不符合施坚雅理论中市场以河流山脉阻隔而成,以交通要地为中心而建的模式。人们对价廉物美商品的追求,促使湘粤赣交界邻地区的不同商品,分属不同的价格平衡点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从而形成复杂的并且是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黄国信认为,以实体化的标准去划定区域,本身并无太大意义。区域研究不应该先划定区域范围,再作茧自缚地研究类型。他提出,区域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区域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如地理、市场、语言、风俗、族群等等)与国家意识形态、朝廷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在其所研究的地区,普通乡民的世界是一个90里范围的区域,地方官的区域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在清代湘粤赣交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形成过程中,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的地方官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区域归属与区域利益观念,这种观念进而成为心理上的区域认同。<sup>④</sup>从施坚雅到黄国信,区域研究经历了从重客观标准向重个人(群体)行为与心理认同的转变。同时,他还强调区域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不同主体互动对区域观念的影响。

黄国信在与施坚雅理论进行对话、反思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对“界邻”地区的关注。在施坚雅的区域理论中,“界邻”地区被视为山高路远、与中心地相对的边缘地带,是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最低端,是中心地、市场、城市的吸附地区而已,其地位显得无足轻重。而在黄国信的研究中,“界邻”地区被置于聚光灯之下,其主体性被重点强调。透过清代湘粤赣交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实施历程,可以看出盐区边界的模糊性、动态性,作为区域间联结的“界”是不能抛开区域进行单独讨论的。正是这些区域特征引起其研究兴趣,并成为其研究主题。黄国信研究得出,市场区不仅不独立如施坚雅九个大区相对独立的模式,市场区之间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施坚雅的经济区界——反而颇像施坚雅理论中连接基层市场

的流动小贩:市场区之间的地区既不专属于任一经济区,又都属于邻近的两个或三个经济区,区域在这里真正流动起来。<sup>①</sup>黄国信对“界邻”地区的深入阐释,使得“画地为牢”的区域变得柔软、流动起来,弥补了施坚雅理论的视角“盲区”。

### 3. 流动性:区域的动态研究

跨区域的流动性研究是“华南研究”超越施坚雅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应强研究了贵州清水江流域的木材开采、运销与社会变迁。清代清水江木材采伐、运输、销售一连串的贸易机制,使得清水江下游地区乃至整个流域,与更为广泛的地域整合为一市场体系。张应强认为,贸易的发展可能是清水江流域融入全国性市场并加速进入王朝体系的重要动因。他的分析重点虽是本地社会的市场、权力诸因素,但其也明确意识到,清水江大规模木材采运活动出现的重要条件乃“清水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生态条件、便捷的水道网络构成、18世纪以后江南地区发展引致的对木材的大量需求、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及长江水系水上运输繁荣。”<sup>②</sup>从张的研究可以看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不足以解释区域社会经济。木材采运带来的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迁,更多体现的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磨合与互动,地方社会对王朝国家“正统性”的诉求以及不同群体为利益、权力进行的博弈。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跨区域往来与流动性造成的结果。

此后,陈春声、刘志伟联合撰文阐述了跨区域的物质流动具体过程,以及其隐含的重大理论意义。由于16世纪至18世纪江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与手工业的进步,对作为建筑材料和燃料的木材需求激增。为满足此需求,西南山区的木材逐渐成为江南城镇依赖的对象。与木材顺流而下相伴生的过程是,商人携白银等货币逆流而上。由于山区人群对于市场交换以及货币、外来商品的依赖并不高,逆流而上用于采购木材的大量白银便在上游的木材产区滞留下来,成为少数民族(特别是女性)服饰和首饰的主要原料。也就是说大量进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在这里成为一种权力、礼仪、艺术的象征物,恢复其物质的特性,而丧失其货币的功能。<sup>③</sup>陈春声、刘志伟试图从白银长距流动以致最终沉淀这一微观层面,解

释大规模的白银输入为什么没有造成18世纪中国明显的通货膨胀。施坚雅的研究过分强调九大区域的独特属性及其发展周期,忽视了各区域间的互动联系。与施坚雅显著不同的是,前述学者研究王朝国家内部的长程贸易,关注跨区域的流动性,突出了各个区域间的动态联系。

在“华南研究”学者看来,不同区域之间并非是孤立的,各区域体系的形成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这与强调区域界分的施坚雅相比,显然更符合中国历史事实。

### 4. 仪式联盟:跨区域联系的重要形式

施坚雅的研究涉及民间信仰与市场区域的关系。他认为,各级贸易中心是庙宇所在地,宗教“教区”和贸易中心——经济腹地所组成的区域相重合的倾向。以四川高店子为例,管理寺庙、负责举办庙会活动的董事会,以及每年在庙会期间负责节日活动秩序的地方治安团体均是由镇民和该市场区域中各个村庄的人组成。庙中供奉的神灵在尘世上的活动范围,也被认为是与基层市场区域相一致的。<sup>④</sup>

其弟子桑高仁受到老师的启发,进一步将民间信仰与地域等级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与施坚雅描述的市场等级体系不同的“仪式组织”体系。依据施坚雅的看法,宗教文化中心与经济贸易中心是相重合的。桑高仁以台湾大溪镇居民赴北港朝天宫朝圣妈祖活动为考察对象,发现仪式朝圣中心与经济中心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人群信奉的妈祖朝圣中心往往分布在北港等边缘地区,而不是在台湾的经济、政治中心台北。尽管两种中心不一致,但也存在交织关系。因为信众们选择朝圣道路时,会利用到连接经济中心的交通路线。<sup>⑤</sup>因此,桑高仁认为仪式组织是施坚雅强调的经济、行政等级之外的又一等级。

郑振满深入分析了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关系。他通过考察福建沿海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研究了民间信仰、仪式行为与区域社会的关系。郑振满研究莆田平原的初衷,主要是对人类学家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不满意,希望能从不同村庄间的相互联系入手,实现社区研究到区域研究的转变。这与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社区的初衷是一致的。郑振满的研究表明莆田平原仪式联盟的空间分布是以

“社”为基础的，<sup>⑨</sup>这就与施坚雅提出的民间信仰以基层市场为中心不同，而且当地仪式体系的形成是通过联盟而不是桑高仁所说的朝圣。在莆田平原，存在众多被称为“七境”的仪式联盟。“境”是指一个“社”的领地，“七境”的意思就是七个“社”的联盟。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大多是五到十个村庄组成一个“七境”，每个“七境”有共同的庙宇，每年一起游神赛会，庆祝神明诞辰。在这些“七境”之上，还有更大的仪式联盟和共同的庙宇、仪式。可见，该区域信仰仪式体系是不同村庄的人群根据“社”的领地范围结成联盟，并通过共同举办跨区域的仪式活动形成的。就这些跨区域的仪式联盟而言，民间信仰行为自有其独立性与运作逻辑，并不一定与市场等级体系相衔接。郑振满探讨区域内不同群体如何通过仪式联系成一个社会文化体系，这无疑是对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的超越。

郑振满的研究还强调民间信仰行为对区域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仪式联盟是莆田平原最重要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合作机制，人们利用神明信仰和祭祀仪式来界定区域内所有人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莆田的庙宇有“第二政府”之称。<sup>⑩</sup>郑的这一看法，突出了跨区域仪式联盟的社会意义。

施坚雅虽然初步提出了民间信仰活动受市场区域限制的论题，但并没有对仪式活动对区域产生的影响以及民间信仰在区域中的地位进行具体分析。郑的研究不仅注重对仪式行为进行探讨，还对民间信仰如何“服务”于区域进行思考，深化和超越了施坚雅对民间信仰与区域关系的论述。

#### 5. 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区域纵横比较的分析模式

“华南研究”在反思施坚雅理论过程中，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也被凸显出来。赵世瑜曾指出，虽然施坚雅从空间角度探讨中国城镇及市场体系引起不少争论，但他从空间的角度探讨中国城镇及市场体系，启发我们换一个角度、立体地考察中国社会。<sup>⑪</sup>赵世瑜提出，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认识是“不可以用某种‘普遍时间’（如王朝时间）来取代‘地方时间’”。<sup>⑫</sup>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国家在

地方的影响各不相同，每个区域的历史发展节奏是不一样的。赵世瑜的上述观点便是对施坚雅区域理论的继承。

在继承施坚雅区域理论的基础上，为揭示区域历史的节奏变化，赵世瑜将“逆推顺述”作为区域历史研究的方式或技术。即将在自己的田野点观察到的、依然活着的结构要素，推到它们有材料可证的历史起点，然后再从这个起点，将这些结构要素一一向晚近叙述，最后概括出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sup>⑬</sup>这就为研究区域历史的发展节奏提供了某种方法论。

与施坚雅研究视角不同的是，赵世瑜提出了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他从考察不同区域现存的社庙系统出发，比较了不同区域社会结构“折叠”和“拉伸”的历史过程。他考察了分别属于海岛、山区、湖区和平原的珠江三角洲淇澳岛社坛、浙江遂昌社殿、苏州东山猛将堂及山西晋祠周围村落中的五道庙，归纳出社的四种类型：只是在大树下或路口、码头放几块石头（类型Ⅰ）；用石块搭起来或砌起来一个台或者一个坛，有或没有神主牌（类型Ⅱ）；一个一两米高、有屋顶的小庙，里面有或没有神像（类型Ⅲ）；人可以进去烧香祭拜的社庙，无论人们叫不叫它社庙（类型Ⅳ）。通过对几种社的形态考察，他寻求制造它们的人群的动机和赋予它们的不同意义。<sup>⑭</sup>赵世瑜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前述四种类型的社，而在华北和江南地区仅能看到类型Ⅲ和类型Ⅳ，尤其以类型Ⅳ为主，几乎见不到类型Ⅰ和类型Ⅱ的社了。他认为，造成这样的状况其实与这些地区经历的社会历史进程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区经历了从明清到民国时期数百年间的剧烈变化，在此过程中，不同人群因不同使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不同形态的印记，它们没有被时间的长河完全淹没或被完全整齐划一。浙江遂昌地区的情况则可能是在“神明正统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几种形态的社，在某个时期被集中放到庙里或挤压到更小的空间而得以保留。而太湖流域和华北腹地地区，由于在漫长的人群定居和区域开发的历史过程中，原有的礼仪标识经过了多次选择、淘汰、清洗和覆盖，经过了多次“神明正统化”过程，礼仪标识变得日益单一和标准化。

赵世瑜把珠江三角洲视为历史过程的“折叠”或

者“压缩”，中原腹心地区则是“拉伸”或者“延展”。他将后者形象地比喻为被拉伸后的弹性皮革，材料表面上的一些特征会被改变，皮革上原来肉眼可见的细小孔隙或纹路会消失不见。由此，赵世瑜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都是层累的，但在不同区域的层累表现各不相同。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折叠”恰恰是某一社会结构的“拉伸”，而某一历史过程的“拉伸”又恰恰是另一社会结构的“折叠”。

诚然，施坚雅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发展节奏，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对区域差异的讨论。赵世瑜的区域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区域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不同经历和发展多样化。<sup>⑤</sup>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施坚雅理论的区域研究视角，即是其多年来形成的有关区域研究的独特认知——“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 6. 多重叠合：区域研究的层次感

如果说在施坚雅的眼中，区域是一种静态的、客观的实体划分，那么“华南研究”更多地是从人群的能动性去探究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乃至世界之间的多重、层叠的关系。

在这方面，陈春声侧重于区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研究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域社会能够全息地、动态地反映地域社会多重叠合的关系及历史发展变化的“时间历程”。区域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国家的历史是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他提出，“地点感”和“时间序列”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脉络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共时态”中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时，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sup>⑥</sup>

就此理论，陈春声以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为例，结合地域历史，从天下、朝廷、官府、礼法、文教等方面，对明清时期韩江中下游地域与国家的关系展开讨论。他认为，“‘天下’一词意味着大一统国家的观念。‘朝廷’是传统中国更具有实体性和可接触性的与‘国家’对应的名词。‘官府’是地方百姓最能直接感受‘国家’存在的机构。‘礼法’则是要使地方的各种风俗符合朝廷的意识形态。‘文教’起到的是潜移

默化的作用，它能使儒家观念和意识形态得以代代相传。”<sup>⑦</sup>明清时期“国家”正是通过上述因素与韩江中下游地方百姓发生互动联系，并深刻影响了该地域社会的历史进程。在施坚雅的理论中，似乎缺乏“国家”在区域社会影响的具体论述，只是在论述非正式政治体制与官方政治关系时中粗略出现国家的“身影”。陈春声对国家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的论述，显示了传统中国与西方社会历史大为不同的面向。

刘志伟曾指出，广州独具的“南方”气质感是由南海海域、帝国南疆与世界体系的历史三重奏演绎出来的。<sup>⑧</sup>从区域上看，广州历史发展的第一重奏应置于环南海中国海区域的节奏中去定位。环南海中国海区域是广州地区人群活动和交往的主要空间，无论是从古代文献上还是从出土的文物上看，广州的文化与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有很多一致性。第二重奏即王朝国家的历史节奏，是本区域纳入王朝国家制度时叠加上去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王朝国家的制度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域。由此，原来由人们交往和活动形成的空间被切割成为不同的国家，形成了帝国内与外的分界。作为第三重奏的世界体系是最后叠加到广州的。这主要体现为历史上广州在世界资本主义贸易活动和宗教文化传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刘志伟以广州为例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区域社会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即理解一个区域社会，要从区域中人群活动开始，然后再把问题置于区域之外的不同层面、更大的体系中去解释。相较于施坚雅以客观标准划定的区域，刘志伟更多强调的是以个人观念、群体行为作为区域研究的出发点，将区域扩展为多重叠合的区域体系进行研究。

就此研究视角，杜树海曾撰文把明嘉靖时期的“大礼仪”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以此考察跨越空间、纵横勾连的“关系”，以及流动与弥漫的观念与心态。<sup>⑨</sup>其研究涉及的是一个涵括边境土司领地、中原王朝以及东南亚朝贡体系的多层区域。在中原王朝这一层面，明世宗嘉靖皇帝通过“大礼仪”的争议和斗争，形成了强调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

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跨越空间的限制,对另一层区域——东南亚朝贡国安南的权力传递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明王朝讨伐安南莫氏篡国行径的行动并未真正实施,但却又牵出位于南征路线之上的边境土司领地这一区域。广西左江上游地区土司们的“篡逆”行为被统统掀开盖子,土司势力受到王朝的沉重打击。杜树海将帝系正统的意识形态置于以上三层区域中考察,认为一旦某种政治氛围形成,不同层级的区域无论远近均会受其影响、制约。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施坚雅偏重经济因素的区域研究,关注到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对区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突破了施坚雅单一平面的区域研究模型。在“华南研究”中,“区域”犹如层次分明的“地层剖面”,极具多重层次感,每一层之间又都透视着不同的联动关系,凸显了多重叠合“区域”的研究价值。

### 三、继承与超越:“华南研究”的区域新定义

追根溯源,“华南研究”与施坚雅开创的区域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等一批年轻学者在施坚雅区域理论的影响下,最早选择商业市镇进行研究,从而开启学术生涯。在后来的研究中,相关学者亦不同程度受到其启发。

科大卫和萧凤霞在1995年合编出版的《扎根乡土:华南社会的地域联系》一书中阐明进行华南研究的初衷。他们承认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区域性研究的必要性,文集从施坚雅区域理论出发,进一步提出可将区域视为一个有意识的历史结构,这一结构可以通过参与其中的人的文化表述来加以表达。他们认为,市场网络和行政结构并非是塑造文化情感的独立变量,而是在区域认同的演变过程中与文化意义交织在一起。<sup>⑤</sup>由此可见,华南研究在肯定施坚雅理论强调市场结构体系对区域社会研究作用的同时,为区域认同研究增加了文化意义这一要素。他们的研究取向从施坚雅区域理论注重经济因素的分析模式,转移到重视区域内人的文化认同和主观意识。

可以说,人的能动性、文化意义对地方社会起到的塑造作用是华南学者侧重的研究取向。科大卫在

谈到其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和思路时就提到,其理论来源除了受人类学家费里德曼的影响外,还深受施坚雅市场、区域理论的影响。施坚雅的理论观点,促使其研究思想架构发生转变,其开始关注基层社会,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动态地思考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思考不同地方归纳到国家大历史中的过程。<sup>⑥</sup>在施坚雅理论的影响下,科大卫提出,研究中国“大一统”的历史需要关注地方上的经历,“礼仪标签”可以视作区域研究的途径。<sup>⑦</sup>科大卫“礼仪标签”的概念,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研究切入点。其《皇帝和祖宗》一书,不仅将宗族这一“礼仪标签”视为理解珠江三角洲演进过程的关键制度,还希望借此鼓吹其他地区研究者做大量的开拓研究,研究人类的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形成。<sup>⑧</sup>刘志伟在论述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开垦史中形成的“沙田—民田”的空间格局时,提出该格局“不只是土地自然形态的差别,更是在地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区分,一种‘族群’认同标记。‘沙田—民田’界限分明的地域空间格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权力的结构。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的演变以及族群问题等都展现了这种结构的动态过程”。<sup>⑨</sup>程美宝考察清末以来“广东文化”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其重视的是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在其看来,“地域”更多指的是地方人群的主观区分或借着地域界限来表达的“自己”和“他者”之别。<sup>⑩</sup>这些基于施坚雅理论认识并企图超越施坚雅的研究,正是前述科大卫和萧凤霞在《扎根乡土:华南社会的地域联系》一书导言中所倡导的。

“华南研究”的发展过程虽然继承了施坚雅理论的成分,但是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此一层面上。如前所述,相关学者基于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通过一系列翔实的案例,深化区域社会研究。这些学者将文化活动置于区域体系构造中考察,强调思想文化对于区域社会的塑造;关注“界邻”地区和跨区域的流动性,以及民间仪式联盟与跨区域联系,把“区域”看成流动的区域、联系的区域与跨越的区域;进行区域间的纵横比较与多重叠合区域关系的剖析,解释了

不同区域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国何以为中国”。刘志伟提出,“在这个理论(指施坚雅由人们的交往形构的区域历史周期去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从对细碎的社会生活的微观分析获得整体的历史解释。事实上,我们多年从事区域研究的经验,也清楚表明,区域性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历史相当的重要。”<sup>⑩</sup>无论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韩江流域地区、福建莆田地区,还是对中原地区、贵州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华南学者注重的是广袤地域空间里不同区域间千差万别的文化。他们走向历史现场,以人的行为主体为出发点,关注的是地方社会人群的主动性和不同区域背后的文化差异,强调的是多元文化对中国社会一体化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不仅仅限于施坚雅提出的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一体化起到的作用。

以人的行为主体为出发点,这就促使华南学者重新思考“区域”概念,提出了自身的区域研究理论范式。刘志伟、陈春声在施坚雅理论的启迪下,结合“华南研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区域(研究)的新定义。第一,传统历史叙事以国家为主体,历史就是国家纪事书,而新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历史,从这个出发点,区域就是由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所形塑的空间。第二,从人类活动考虑,不同主体的行为可以划出不同的区域,农民、商人、读书人、官员,其活动的区域是不同的。因此,研究对象不同,区域的意义自然跟着不同。而每一种主体,随着关注其社会活动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区域范畴。以不同的角度去界定出来的多种区域范畴,又是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就成了一种层次丰富的、立体的区域体系。第三,“区域”本身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这要求研究者努力“还原”实际的历史过程,即把共时性的空间结构还原为历时性的历史过程。第四,“区域”必然有其发展脉络与内在运作机制。区域研究就像在讲一个多线索的复杂故事,需要切身理解每个历史主体(群体与个人)的成事动机、理由与社会机制。第五,区域研究的核心还是把握研究者要问的问题,怎么研究一个区域,关键不在于划定了什么“区域”,而在于你要提出和回答什么问题,区域是跟着问题走的。第六,区域研究意义更在区域

之外,区域研究不仅要置于彼此间的互动中,更需要置于更大区域的脉动中去认识。比如西域、南海、东亚海域、蒙古高原等区域研究,不仅要研究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域本身,也要从它们的关联和互动中去建立历史认识;区域研究需要全球史视野,研究珠江三角洲、闽南这一类滨海地域,在对这些特定地域做微观考察的同时,必须具有跨国的全球视野。<sup>⑪</sup>

刘志伟、陈春声对区域(研究)的新定义,已经走出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施坚雅更多按照客观标准划定区域,而刘、陈却以人、群体的行为、观念探寻区域内在的脉络、机制,并将区域扩展为多重区域的重叠体系,将区域互动与区域之外纳入考虑范围,增添了考察区域的多维视角。从前述可知,经过几十年的学术演进,从施坚雅到“华南研究”学者,“区域”从一开始更多是“研究对象”已经进化到今日的“研究方法”。

总之,“华南研究”实现了对施坚雅区域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将区域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启示。中国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才能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

感谢黄国信、吴晓美、刘志伟、覃廷佳以及编辑部为本文提供的修改意见;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同为本文第一完成单位。

#### 注释:

①详见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4页。

③④⑤⑥⑦⑧[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1~23、44~46、49、7、39页。

⑨⑩[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51~252、334~335页。

⑪⑫[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⑬[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 ⑭赵世瑜:《我与华南学派》,《文化学刊》2015年第10期。
- ⑮⑯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
- ⑰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 ⑱萧凤霞:《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 ⑲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 ⑳黄国信:《“鸡零狗碎”、学术对话与其他:〈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写作随感》,《博览群书》2007年第3期。
- ㉑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06页。
- ㉒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77页。
- ㉓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 ㉔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8~49页。
- ㉕P. Steven Sangren,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9 ~ 121.
- ㉖“社”是明代里甲系统中的一种仪式单位,一般也叫“里社”,莆田地区几乎每个村庄或家族都有自己的“社”。参见郑振满:《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态与仪式联盟》,周尚意、刘卫东、柴彦威主编:《地理学评论》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3页。另参:Kenneth Dean,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vol. 1,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Return of the God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 ㉗郑振满:《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态与仪式联盟》,周尚意、刘卫东、柴彦威主编:《地理学评论》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33页。
- ㉘赵世瑜:《从空间观察人文与地理学的人文关怀》,《读书》1997年第5期。
- ㉙赵世瑜:《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一种实践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6页。
- ㉚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㉛赵世瑜:《历史过程的“折叠”与“拉伸”——社的存续、变身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 ㉜赵世瑜:《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一种实践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8页。
- ㉝陈春声:《走进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 ㉞陈春声:《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35~439页。
- ㉟刘志伟:《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
- ㊱杜树海:《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 ㊲Helen F. Siu, David Faure, "Introduction," in David Faure,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 ㊳[英]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9~30页。
- ㊴[英]科大卫、张士闪:《“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礼仪标签”指的是地方社会中一些具有个性特征的礼仪传统表达。
- ㊵[英]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祖宗》,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1页。
- ㊶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㊷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15页。
- ㊸刘志伟:《从区域中探寻中国历史:问题意识与资料方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 ㊹石志杭:《区域史的魅力——刘志伟、赵世瑜、温春来教授沙龙对谈》,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2019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6~18、38页;刘志伟、任建敏:《区域史研究的旨趣与路径——刘志伟教授访谈》,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创刊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页;陈春声:《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8~12页。